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季羨林散文选集

7
2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季羨林散文选集

马相武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季羡林散文选集

马相武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4 插页 4 字数 190000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1616-1/I·1443

定价:9.6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马相武

1988年10月26日，季羨林先生写完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他在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的自传中这样结尾：“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然而，“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却很不平凡。

闻名中外的学者季羨林，从1946年起，便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一级教授。1978年之后五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当时家道中落，形同贫农。他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私塾里念了一些《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由于报考的中学居然考了英语，而他当时又恰好在高小读书时业余自学了一点英语。出的试题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他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了，但上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自传》）

据季羨林回忆，没有子嗣，“绝顶聪明”，全靠自学的叔

父对侄子寄予极大期望，要求也特别严格，并亲自讲授。他的养育，对季羨林的影响极大。中学的正式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课外除了上古文及英文补习班之外，又读了大量的旧小说，其中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他最不喜欢的是《红楼梦》，但却很愿意读《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

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读书时，国文教师、桐城派的古文作家王崑玉对他影响极大。那时，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9年，季先生转入省立济南高中，虽只一年，但在国文方面，受到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人的直接指教，前二位还是他的“业师”。在倡导普罗文学，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鼓励和影响下，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当时的许多白话作文也大得董秋芳先生的赞赏。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但他仍刻苦钻研中国旧籍，读了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和姜白石等诗人词人的作品。

1930年高中毕业，他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当时他选了在那时被人们认为出国机会多的清华大学，选报了西洋文学系。在所修课程中，获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即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即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几十年后他感慨道：“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

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清华读书期间，他继续写作散文、诗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常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发表。并成了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的特别撰稿人。

在清华四年，他全靠在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的接济以及他的家乡（原清平县）给的奖学金。1934年夏，他从清华大学毕业了。在当时，毕业即失业。他找工作碰了钉子。幸亏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他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大学期间发表的散文作品在帮助他找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那些散文，他被人们奉为作家。

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他来到了曾经培养出许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蜚声世界的大学城哥廷根。在哥廷根大学，他在十分艰难的条件 下，苦读不辍。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的时候。德国在严密封锁下开始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食品定量供应。越来越少的食品供应使他几乎饿昏，有时他甚至饿到像果戈理《钦差大臣》里一个饿汉喊的“简直想把地球一口吞下去”的程度。更加难熬的是对祖国和家人的怀念。战争切断了他与祖国和家庭的联系，也阻断了返归祖国的通道。在散文《海棠花》里，他写道：“祖国又时来入梦，使我这万里外的游子心情不能平静”；邻人花园里的海棠花触发作者浓重的乡思情愫：“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

指导他的教授是著名学者西克(Sieg)、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布劳恩(Braun)等。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已经退休的年届八旬的西克教授毅然出任导师。

在西克教授指导下，他钻研《大疏》、《梨俱吠陀》、《十王子传》和《波你尼语法》等。已是耄耋之年的西克教授毫无保留地将看家本领都传给了他当时唯一的博士生。西克教授坚持要教曾在古代流行于中亚地区的吐火罗语。这位德国教授曾花了几十年的精力读通了被世人称为“天书”的这种语言，成了这种语言的最高权威。他的严谨治学对季羨林影响很深，他同几位德国老师不存丝毫的种族偏见，也使季羨林非常感动。尽管当时工作繁重，又患神经衰弱，可是老人的热心，使他不顾一切地发愤攻读。

1946年，35岁的季羨林，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被誉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把他介绍给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适、傅斯年和汤用彤。当年，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十年“文革”中，季羨林也曾靠边站，挨批斗。1973年，他在逆境中开始了堪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媲美的世界名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那时，他必须到学生宿舍楼看门值班，由于不能把原著带到值班室，他就每天把一段原文抄在小纸条上，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下班后再赶紧用中文记录下来。这部史诗性巨著的竣译，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被学术界赞誉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获得了国际梵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极高评价和热情赞扬。

在印度语言文化研究领域，他有大量多国文字翻译作品，其中成就最大并为他带来了世界声誉的应首推他翻译的二百多万字的梵文文学作品。他还发表出版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主编《印度文学史》和《印度文学研究集刊》、

《国外文学》两种学术刊物。我们仅以他对印度语言文化研究为例,就能看出他所作出的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1980年以来,他开始译注新疆博物馆所藏吐火罗语剧本《弥勒会见记》写本残卷,并发表了《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漫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等许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对吐火罗语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国内学者在致他的贺信中说:“这篇文章(指《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发表之后,让有关的外国人知道我国建国以来,不仅在吐火罗文 A 的文书文物中有远远超过以前的大量重要发现,而且我国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从事外国人根本想不到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也有力地回击了那种“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讥讽。日本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研究室的原实教授于1981年在第五次世界梵文大会上指出:季羨林先生“以中古印欧语形态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而闻名于世”。季羨林以他卓越的研究成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为中国学术界和北京大学赢得了声誉。

如今 81 岁高龄的他仍旧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他曾经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语: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他在几十年

的学者生涯中，形成了一套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每天早晨都是四点起床，吃一点烤馒头片，啜几口茶，然后在书房里工作到七点多再去上班，外出开会、访问，在飞机上、火车上他也抓紧时间进行思索和写作。他的独特的工作方法，反映在书房内几张书桌的安置上，一张用于学术论文研究，一张用于翻译项目研究，还有一处堆放着其他各种材料。近年来，他习惯在两三个“战场”同时作战。既是他作为特殊的身兼数职的学者的工作需要，也为着节省宝贵的时间。他谈起自己的年纪和身体又颇为自豪爽朗：“我注意了一下中国文学史，过八十岁的作家诗人没有几个。”征服繁忙和紧张后获得的健康长寿，足以使他乐观通达。

季羨林早已功成名就，干扰也颇为繁多。他总是积极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有效地排除各种外界干扰。为此他要求自己同时思考几个问题，“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自传》）为了对付大量“态度欠端，话风不正”的会议，他“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回首八十年的生活道路，老人心地坦然，壮心不已：“我虽然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但在老人中还算是年轻的，我既不伤春，也不悲秋，既无老之可叹，也无贫乏可嗟。生当盛世，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活许多年，多做许多事情。”（《朗润集》自序）

季羨林是一位独具一格的散文作家，他的作品贯穿着

严肃执著的艺术追求。在近六十年中，季羨林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成为国内独具一格的散文作家。在《〈朗润集〉自序》里他自谦地说：“至于我自己写的散文，那只能算是一些习作，是一种坚持了五十年的习作。”他能坚持散文创作，数十年不间断，主要是由于他对散文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好。他说：“我对写东西又锲而不舍，时间竟长达五十多年之久，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大概也是一种‘旧习惯势力’吧。”（《季羨林散文集》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创作中，他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说：“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愿望。在这样的時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正是这种厌弃八股陈腔刻意求新的精神，没有真情实感决不动笔的态度，使他的散文朴实真挚，既涤尽铅华，而又饱含诗情画意，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独立人格精神的艺术升华。曾经三十多次访问过中国的日本汉学家依田熹家在日译本《季羨林散文集》（日文书名为《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的译者后记中这样概括自己对季羨林散文作品的读后感，并估价了作者散文创作的价值，特别是对于日本汉学研究的价值：

读了这一系列文章以后，笔者感到它恰好传达了从“五四”运动直到现代，在动荡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尤其是季羨林先生这样将中国自古而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和西欧最高学术水平集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是代表了这一方面的典型。

日本关于这一方面的介绍虽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多，而且像这样几乎跨越了那整个时代的例子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我们现在对邻国的情况必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不过在这一点上，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以外，对心理变迁的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为了了解这一方面，我认为将这部文集介绍到日本也是很有必要的。

的确，他的作品是动荡时代中的心理变迁的体现，同时，将他的作品贯穿起来，会感觉到它下面的始终未变的东西。由此，反映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过程中，蕴蓄的那种流动着的一贯的人格精神。他一贯认为，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真实，他的散文是他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反映在散文的格调上，就是前期（三四十年代）作品的抑郁隐晦，中后期（五十年代以后）作品的明快昂扬。在回忆建国后曲折历史和人生道路的作品中，表现出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的愤懑，对遭受苦难的知识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的思索，感情深沉而信念坚定。《春城忆广田》以相当洗练的笔墨概述春城昆明之美，在怀念、赞美春城那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之后，自然想到它曾经历的凄风苦雨，但这只是略略述及，很快又由春城的文化，想起古人的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并自改为“冠美满昆明，斯人独已逝”，“斯人”即同作者情谊很深的每来昆明总要见面的李广田（曦晨）同志。从同曦晨交往的回忆，进入对故友的充满深厚感情的议论：“他是多么热爱这似海的春光。如花的盛世啊！然而，这样一个人到哪里去了呢？我也是热爱这似海的春光、如花的盛世的，但我只觉得茫茫大地，独缺此人。我心里的空虚是无论如何也填补不起来的。我感到寂寞，感到

凄凉；为了他，我将永远感到寂寞，感到凄凉。”随即在结尾却转而由这“寂寞”和“凄凉”升华并点及缘由：“我本来就是热爱这春城昆明的，现在又增加了一个促使我爱的因素。这里是广田生活过的地方，工作过的地方，他的遗骨又埋在这里。这就会使我的记忆的丝缕永远萦绕在一座美丽的春城周围。我将永远怀念广田，永远爱这座春城。”

二、季羨林的散文从题材上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从描写“身边琐事”出发的。正如依田嘉家指出的，这就像以身边的物体为美而画出的静物画远比画珍奇的风景画要难得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作者的散文中，梦、黄昏、极平凡的人物这样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的题材被描写得美好而活灵活现。这种描写，是作者在详细的观察之后，抓住对象的内部特征，再加入自己的幻想以后的结果。这样的散文兼备了深刻的思索和丰富的想象，同时具有非常的表现力。而且，这种描绘静物的力量对更为复杂的题材也能充分发挥出来。作者曾在《我的处女作》一文中这样概括《枸杞树》的精神：“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十九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作者说，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他，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枸杞树》。

他的散文，不属于文采张扬恣肆的一类，文风也不是简古典雅的。给读者以强烈感染的正是那些“身边琐事”。“它

真挚、平易、亲切，在朴实中蕴涵着幽美，在静穆中饱含着热情。”（李侃：《文如其人》，《瞭望》1988年第1期）同时，它体现了作者曾明确提出的“小中有大，小中见大”的自觉追求。这正是作者对中国散文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那些“身边琐事”，到了作者的笔端，汇集起来，构成了50年中国散文史的一个真实的缩影。《香橼》借书桌上摆着的一只从云南思茅带回来的大香橼，把思茅今昔的不同作了对比，表达了对昔日“蛮烟瘴雨之乡”，变成如今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乐园”和“宝地”的欣喜、欢悦。

三、有的评论文章用“文如其人”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这的确是恰当的。从他的大量散文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北方农民的朴实坦荡，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以及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他的散文质朴自然，情意真挚。《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写的是作者在公共汽车上无意中为一双长满老茧的老妇人的手所深深地吸引，他的心“立即震动了一下”，他看到的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和“银丝般的白发”，由老妇人的这双手，他想起自己的母亲、王妈和另一位老大娘的同样的手，她们的手，伴随着他的生长和成长。作者通过对曾经抚养、照顾过他的一双双手的回忆和议论，表达了对车上老妇人的“肃然起敬”，更抒发了对无数哺育自己成长的劳动人民的感激之情。作者常常借景抒情，以事议理，但也不时直抒胸臆。在《爽朗的笑声》中，他表示：“我相信，一个在沧海中失掉了笑的人，决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也相信，一个曾经沧海又把笑找回来的人，却能胜任任何的艰巨。一个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能笑的民族，决不能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只有能笑，会笑，敢笑，重新找回了笑的民族，才能创建宏伟的事业。……”

他的许多散文，深藏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Wala》虽属早期作品（1941），但已经很少隐晦虚缥的情绪和抑郁的笔调。它写六年前在波兰火车上邂逅相遇的一个波兰女孩子 Wala 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六年后一位中国同学谈到附近新来一位被德国法西斯抓走的波兰女孩子，当时他的眼前电火似地一闪，立刻浮起 Wala 的身影，以至于为这“说不定”而难以入睡。从此每天要绕路到她干活的那个菜园子附近去走上两趟。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使他认为 Wala 的命运不会同这女孩子的有什么区别，或者还更坏。他怀着强烈的同情心，无奈地期待着“相逢”和相互安慰。但对法西斯的控诉是力透纸背的。

他还有些作品表达了对故世的母亲、友人真切的怀念，作为羁留海外的学子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还有对印度、缅甸等许多亚非国家普通人民的深情厚谊。如《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作者去苏联塔什干，参加国际会议，在玫瑰花丛旁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两次短暂的见面，却使作者真正爱上了这个热爱人民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的小孩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真挚动人，以至作者毫无掩饰地坦露自己渴盼的心灵那层层波澜：“我心里想：第一次见面是不期而遇，我没有能够带给他什么东西当做纪念品。第二次见面又是不期而遇，我又没有能够带给他什么东西当做纪念品。我心里十分不安，仿佛缺少了什么东西，有点惭愧的感觉。”实际上，正是由于作者对男孩子真挚的爱和真诚的“惭愧”，才产生

读了这篇感人肺腑的散文。作者写道：“我同那个小孩子这一次见面以后，我的心情同第一次见面后完全不同了。不管我是多么忙，也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的思想里总常常有这个孩子的影子。它几乎霸占住我整个的心。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要到大会上去献花的那一天上。”直到五天的访问阿拉木图以后、返回塔什干时，才再一次同小男孩相遇。原来小男孩也每天都来找他。他迫不及待地、“十分兴奋甚至有点慌张”地向小男孩赠送了准备好的纪念品，相互留了地址、姓名，相互临别赠言，依依惜别。作者描述道：“因为过于兴奋，过于高兴，我在塔什干最后的一夜又是一个失眠之夜。我翻来覆去地想到这一次奇迹似的会见。……想来想去，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我站起来拉开窗幔：对面纳瓦伦大剧院的霓虹灯还在闪闪发光。广场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那一丝丝的玫瑰花的确是看不清楚了，但是根据方向，我依然能够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在黑暗中，它们仍然在散发着芬芳浓烈的香气。”热烈的写实，进入极致境地，自然出现了象征。它已经不是一般地喻示作者和小男孩的动人友谊，而是蕴含着中苏开始交恶的时期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感永存于普通人的心中。

四、他的散文在语言上具有质朴而凝炼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受西方散文作家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诗人的影响。语言从句式到修辞，讲究技巧，尤其喜用复沓、排比、象征，观察体味细腻，敏于景物感受，强调浓郁色块的运用，状物写景同抑郁低徊情调和感伤心理融为一体，然而词语轻捷，意境优美朦胧。《枸杞树》、《黄昏》、《年》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看：

在雨天，牛乳色的轻雾给每件东西涂上一层淡影。这苍黑的枝干更显得黑了。雨住了的时候，有一两个蜗牛在上面悠然地爬着，散步似的从容，蜘蛛网上残留的雨滴，静静地发着光。一条虹从北屋的脊上伸展出去，像拱桥不知伸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枸杞的顶尖就正顶着这桥的中心。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阴影，渐渐地爬过了西墙。墙隅的蜘蛛网，树叶浓密的地方仿佛把这阴影捉住了一把似地，渐渐地黑起来。只剩了夕阳的余晖返照在这苍老的枸杞树的圆圆的顶上，淡红的一片，熠熠着，俨然如来佛头顶上金色的圆光。（《枸杞树》）

在《黄昏》中，作者把黄昏景致的描述同追根究底的议论，以及美丽的想象，融合在一起；不断的转折、设问，又赋予文章层层递进的气势，给人们以富于议理思辨性的深刻印象：

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没有？黄昏真美呵。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黄色的消失，鸦背上白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

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从东方么？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从西方么？